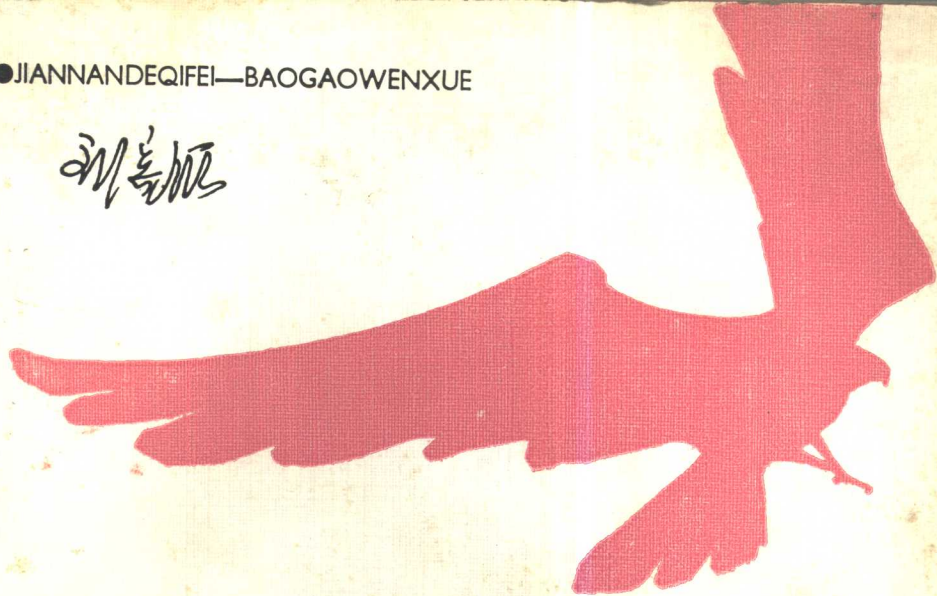


●JIANNANDEQIFEI—BAOGAOWENXUE

刘善熙



艰难的起飞

●JIANNANDEQIFEI—BAOGAOWENXUE

刘 宾 雁

# 艰难的起飞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长沙

# 艰难的起飞

刘 宾 雁

责任编辑：高 彬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31,000 印张：11.625 印数：1—15,600

统一书号：10109·1468 定价：(平装)1.25元(简装精装)1.40元

## 前 言

语言有一个天然的弱点，就是内容有时会从概念里悄悄溜走，留下一个语言或文学的空壳。不幸的是，这空壳里又会被装进全然相反的内容。然而还有更大的不幸，就是语言的空壳有时竟会主宰千百人的行动。

从一九七九年春天起，我走过十个省分。所经城镇，无处不在热气腾腾地大兴土木建造住宅。一个城市每年增添几十万平方米，一百万、二百万平方米居住面积，已经是常事。这种规模，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是空前的。也超于我的预想，因为建筑住宅是一切产业中投资大而资金收回最慢的一种，我实在想不到党和国家会下定这样大的决心来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在喜不自禁之余，也每每产生一个联想：“既然经过十年动乱，经济上如此困难，我们还能拨出巨款大规模兴建住宅，那么六十年代以至更早的时期，经济上宽裕得多的时候，为什么倒建得很少呢？”继而又想到，正是在“为人民服务”那五个字喊得最响、写得最大最多时，住宅建造得最少，后来竟全然不建，人口却生育得最多。人民，人民……为人民服务，首先要考虑人民的生存，而为了能够生存，一个人几平方米的容身之地难道不是起码的需要吗？如此浅显的道理何以长期被忽视，竟把人的基本需要排除到“服务”之外了

呢？

可见，口号和它的内容是可以分离的。抛开少数野心家和骗子不谈，当时多数人真诚地相信这个口号及其当时的实际内容，大约是以为人民为了革命是不必计较衣食住的。其实，就是在那场“革命”把人们搞得昏昏然的狂热年月里，人民也依然放不下自己生存的基本需要。随便走进北京一家院落，就会看见天井在日见缩小，每一家都在向外扩张，自行设计、自筹材料、自行施工的各种风格样式的住房、厨房、贮藏室等等，吞噬掉花草树木，把方方整整的院落蚕食得面目全非，仅留下勉强可以侧身而行的通道了。很多邻里纠纷、争吵以至于殴斗——有伤革命体面和违背精神文明的种种心理和行为，就由于空间过分狭窄而发展起来了。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四十周年，文艺界正在重新学习和研究这部长期指导我国文艺和人们思想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同志的很多论断，今天对于我们仍然具有伟大意义。但是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中国经历了至少五个历史时期。因而，当听到有些同志重提“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时，不免想到：他知道“工农兵”本身在四十年间几大历史转折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吗？如果我们一方面赞颂我们党几十年来建树了多少丰功伟绩、我们国家发生了多大历史性变化，却又以为工农兵，即人民的大多数，他们的愿望、需要和生活方式，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仍然大体上和四十年前的延安时期相同，因而认为为他们服务的文学艺术也应大体一样，就不大好理解了。

上述主张，其实也违背了毛泽东同志那篇重要讲话的精

神实质，至少是它的方法论。他在“结论”中一开头就说：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接着，毛泽东同志在指出“现在的事实”后说：“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种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我们的一个沉痛的教训，不就是曾经背离了这种科学方法，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基础，而是从主观臆想或“定义”出发，以致产生并实行了背离中国实际、亦即中国人民的真实需要与愿望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吗？

生活不断纠正着人们的偏见，但偏见也并不驯服，它还每每要来纠正生活，拒绝“从实际出发”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尽管某些概念已经成了磨损得难以辨认的金币，却还要依旧在市场上流通。

认识什么是我们的实际，不是件易事。据北京一个中学的教师们反映，近年来学生的思想状况变化很快。学生的思想特征每两年就发生一次急剧的变化。这自然是我们急剧发展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思潮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把三中全会以来这三年内我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同建国以来的任何三年相

比，便可以看到：一方面，我们前进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同时，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之多，之复杂，也超过了以往。因而，即使是一个思想没有被偏见所俘虏、感觉和思维尚未迟钝、生活在激流之中而不是深居简出、养尊处优的人，也未必能够经常跟得上时代的脚步。

现实主义文学，它的主要特征从来不是描写尽人皆知的事物，而是向现实作更深一层的探索，把被掩盖着的、因而不能被人直接觉察的现象之间的联系即本质揭示出来。满足于人云亦云、重复前人的主题和思想而不作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尝试，文学就不会发展。至于为追求某种个人功利、迎合某种需要而装扮或歪曲现实，那就更是同现实主义背道而驰了。对于人民和对于社会主义有坚定信心的人，是不必回避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矛盾的，因为认识和揭示事物的本质不会有损于社会主义事业；从为人民和为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描绘我们的现实，既不会使人们高枕无忧、陶然入睡，也不会使人惊慌、沮丧，反而会使他们振奋、清醒，以加倍的信心和勇气投身于现实的改造。这是几年来的文学创作多次证实了的。

近来，连某些与文学无缘的人也十分关心起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来了。但近年来报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足够真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真实呢？这个问题却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以来人民生活的巨变，社会生活中主要矛盾的发展，还远远没有以足够的广度和深度反映到报告文学的画幅中来。

然而在作品之外，从报告文学的遭遇中，却曲折地反映

出我们社会现实中的某些矛盾。比如，报告文学所赞颂的先进人物、四化的闯将，一经报道，处境便恶化起来，遭到冷遇，甚至压抑。作品越是触及我们社会前进中遇到的阻力，它本身遇到的阻力就越大。“失实”，“严重失实”，成了这些作品的最常见的罪过。这种责难，究竟是希望报告文学更准确、更深刻地反映我们时代的真实呢，还是企图借此否定作品所反映的真实？还很值得研究。

真实有大小之分。小的真实(次要的事实和细节等)固然也应力求准确，错了要改，也可以批评，但决定作品生存权利与价值的，毕竟还是它所反映的那个大的真实：它所提出的问题，是否确实存在并有一定意义？它所反映的主要事实或现象在彼时彼地曾否发生和存在过？作品对现象的联系和本质所作的揭示，与彼时彼地的现实是否一致？……等等。

环绕着报告文学发生的事，在生活中也同样发生着。对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十分认真的人，往往并不愿意把他那里的真实情况展示给别人。不愿意让人民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也同样不愿意使党了解真实情况。然而了解这些情况，对党和人民都是十分必要的。

从一九七九年五月到一九八〇年五月，有两位共产党员干部到一个县进行一次调查。他们的经历。很有意义，因而我要请读者耐着性子，听我讲一讲这个真实的故事。

这以前，也曾有很多人多次到这个县了解情况、处理问题。县委领导采取的对策，一是汇报假情况，二是拿好酒好菜把来人的嘴堵上，三是走的时候给你拿上吃的用的，还主动征询来人“有啥困难没有？孩子办个户口、安排个工作什

么的，尽管开口，不算啥……”

这样，县委班子和党组织内部的严重问题，就长期被捂住了。三中全会以后新恢复工作的一位省委书记给去该县了解冤假错案何以迟迟不得彻底平反等问题的两位干部布置了一个任务：因为省委对各县领导班子的情况不大有底，请他们摸一摸这个县领导班子的情况。

这两位同志没有被“堵住嘴”，但仍然遇到了各种干扰。他们直接走访干部、群众，还是了解到很多重要情况。这就激怒了县委的人，他们以在群众中造谣、向省委诬告以至写匿名信陷害等办法攻击这两位同志。但由于省委支持，调查者本人也坚定不移，终于未能得逞。

这样，为了弄清这个县委班子的主要问题，他们竟不得不用去八个月的时间。

我听过这两位同志的详细介绍，并仔细阅读了他们的全部调查记录。那是些非常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可以回答人们心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比如，今天正在进行的打击经济领域中犯罪活动的斗争，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三反”、“五反”运动三十年后的今天，经济犯罪反而严重得多了呢？不是先后进行过四次全国性的打击经济犯罪的运动吗？为什么不灵呢？那个县的情况就会给我们不少启示。

那个县的很多干部和广大群众揭发检举少数干部违法乱纪、贪赃枉法罪行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但是由于从县委领导干部到中层和基层，一批人结成了不正常的关系，群众和干部的检举、上级党委的过问，都始终未能奏效。

由同乡、亲戚、老上下级、“文革”中的帮派，主要是经济上利用国家物资和集体财产相互馈赠、相互行贿的关系组成的一张“网”，把经济犯罪分子保护下来。这就是说，通过经济犯罪形成的不正常关系反过来又保护着经济犯罪分子。由于上级督促而不得不进行调查的时候，认真调查的人总是被撤换下来，换上去的人便按照领导意图把问题查“没”了，这种人便受到提拔重用。本来，一个犯罪分子的暴露，会使那张“网”出现一个破洞。但由于那张“网”的特殊机制发挥的作用，这个洞就可以这样修补起来，并且由于那些把问题查“没”的人补充进来，这张“网”反而更加牢固了。

运动期间，情况有所不同。比如一九七七至七八年的“双打”运动，确实破获了一些贪污案件。但是从那年全县最大一起贪污案的发展和处理始末，可以见到为什么这种斗争是不彻底的。水利局的会计傅某，是在党委书记毕某的纵容、包庇之下才有了作案的优越条件的。为了把傅某拉入党内，毕某不惜违反党章，事先撤换了两名党支部委员。毕某还出力把傅某树为先进工作者，到处介绍财会工作的先进经验。这自然有力地掩护了傅某的贪污活动，而毕某也从中得到很多实惠。“双打”运动中，毕某采取多种办法企图转移斗争目标，庇护傅某过关，终究无效，傅某被逮捕，判刑了。但他的后台毕某却安然无恙。于是，从运动后期起，这个党委书记便运用他手中的权力和县里的关系，对办案人员和运动的积极分子逐一施加打击报复。为了撵走一个对头，甚至不惜停办一家工厂，或实行机构改组，把两个股合并为一个。

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过去了，贪污盗窃分子是怎

办了一批，但是促成贪污犯罪的组织条件——那些为贪污提供方便、庇护甚至合作，以及破坏反贪污斗争的权势人物，却保留下来了。这便成为重新萌发新的贪污犯罪的后患。另一方面，一批好人，反贪污斗争的积极分子却往往遭到打击，因而挫伤了他们本人以及周围人的斗争信心和勇气。这又成为另一种后患，因为犯罪分子受到的监督、抵制和反对被削弱了。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省委这两位同志对该县进行了有效的调查，这件事本身就使长期耳闻目睹上述情况、为之焦急而束手无策，因而心情苦闷、信心减弱的干部和群众受到鼓舞，认为党的领导机关终于了解真实情况了。及至真相大白，惩办县里的一批上、中层干部以后，人们便更加振奋，对党的信心大大增强了。

从这一段叙述里，可以看到，什么人害怕、以及如何惧怕党的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了解真实情况；真实情况的揭开带来的政治效果又是什么。

这一场斗争如果写成报告文学，效果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它只能使一个县人民受到的鼓舞扩展为全国读者的振奋，使人民对于我国现实的了解和理解有所丰富和加深，并从这里得到启发，把当前这场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进行得更好。

但是，可以想见，一定会有人反对这种报告文学。理由除了“失实”，还会有一个：把这种情况公之于众，会不会影响党的威信呢？

人，是能够感知和思考的。只要是客观上存在、又同人们的利害相关的事物，迟早总要通过各种不同途径为人民所

知晓。很多社会现象就在他们周围、眼前和身边反复运行，人民群众的感知一般还要比领导机关更敏锐些。由于经济生活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比起战争年月、被包围和被割裂而又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农村，人们相互交往、互通信息、交流思想的频繁度，不知增长了多少倍。人类生活信息传播的这种发展趋势，从来是有利于进步力量的。

然而人们受到各自生活地域、职业、阅历和认识能力的限制，有些人则受到生活环境和地位远离底层、接触群众机会较少以及某些陈旧观念的限制，有很多情况无从了解，了解到的又未必能够正确认识。文学和报告文学的一种社会职能——认识的功能，便是这种需要的产物。

文学作品不同于生活本身，它不是材料的简单铺陈，是经过作家加工，即渗透了作家思想、感情的产物。我们的主张是写现实生活中的斗争，而不是单纯的揭露。写斗争，必然会触及生活中阴暗的一面。但只要作家的态度不是有意诋毁或消极旁观，艺术中的“阴暗面”就会成为唤起人们去消灭生活中“阴暗面”的精神力量。这种作品的社会效果就会是对于邪恶的愤怒，对于斗士的敬慕，对于纵容和庇护恶势力者的鄙视和建筑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斗争勇气和对于胜利的信心。

我们应该了解和信任我们的人民。一封大庆建筑工人的来信，描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国人民思想和情绪的某些特征，以及文学作品在他们身上产生的社会效果，值得摘引几段：

“我通过生活中的接触看到，许许多多每天进行着最平凡工作的最普通的人（可能是工人或农民，也可能是老师或阿

姨，可能是售货员或会计，也可能是护士或保管员……），他们对于我们的党是有感情的，对自己的国家是有感情的。他们希望自己的祖国日益繁荣富强，希望自己身边的党的成员确实是先锋、表率，是信得过的革命力量。他们对那些打着革命旗号以营私的现象是看在眼里，伤在心上。对十年浩劫所带来的种种不正之风是不满的，气愤的。他们很着急，却又无能为力去改变现状。他们很有些心里话想说说，可找谁去倾吐呢？他们没有接触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同志及陈云、邓颖超、李维汉、帅孟奇等老一輩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福气，而身边一些居于领导地位的人的言行，又不足以使人心悦诚服（更有甚者，恰恰是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戏弄了群众对党的一片忠贞之情）。他们对于党中央知不知道自己所感受到、并为之着急的这一切，对于党中央是不是也这样焦急，心中没有底；他们对于能否最终战胜这种种丑恶现象，是忧虑的，是信心不足的。这样，在工作中他们是踏实的，但在思想上却是苦闷的。”

当这些普通群众看到有的作品写了他们“看在眼里，伤在心上”的那些问题时，他们的反应又如何呢？信中说：

“十年浩劫在全国各地表现的形式尽管千奇百怪，但种种丑恶现象产生的环境和条件，在本质上说来是一致的：党风遭到破坏，民风遭到破坏，党组织的不纯，党群关系的削弱，是人人有目共睹的事实。”因而，这类作品并未使他们大惊失色，丧失信心。倒是觉得“这类作品的作者感受到了普通老百姓的焦急的心情和朴实的愿望，并且为从根本上最终消灭这些革命肌体上的病毒开始了探索（他们这样做，也是以自身

特有的方式向党中央汇报国情)，他们的脉搏和人民的脉搏跳到一起了。……他们分析了这类社会现象产生的条件，重新认识了我们的社会，我们党的组织所受到的左倾路线的损害和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中的问题，以便采取措施，杜绝那些坏人的繁殖。这样，它们就使人们感受到光明和希望，增添了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丑恶的力量。”这封信的作者本人呢？他的反应是：“看到和想到这些，我浑身增添了希望和力量，感到和党的心贴得更近了，对最终战胜身边种种丑恶现象充满了信心。”

这些话，是可信的。《人妖之间》发表以来，全国各地许多读者的来信，反应几乎全都和这位工人一样。

正是这种反应，坚定了我对于一条真理的信心：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人民是更加清醒更加成熟了。他们需要的是真实地反映我们严峻的现实。他们为生活中一切光明的东西感到欣喜，但不会陶醉；他们为生活中阴暗的一面忧虑和焦急，但又不绝望。只要我们真实地描写我们所从事的斗争——伟大而艰难的、令人振奋的斗争，就会使人们增强信心。

因此，我便写了这本东西。

深深感谢给我支持、给我鼓舞并不断以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丰富着我的读者们！

一九八二年五月，于北京。



鲍乃镛摄

#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在桥梁工地上      | 1   |
| 人妖之间        | 44  |
| 在罪人的背后      | 101 |
| 艰难的起飞       | 116 |
| 路漫漫其修远兮     | 134 |
| 风雨昭昭        | 177 |
| 千秋功罪        | 235 |
| 好人啊，你不该这样软弱 | 319 |

## 在桥梁工地上

—

在河对岸，大桥工程的桥头堡上，我终于找到了桥梁队的罗队长。他正在对一个领工员模样的人布置着甚么事情，那人吃力地用铅笔朝一个小本子上记着。

大概这几年里我变了许多。他眯起眼睛辨认了一会儿，才迈着大步走过来和我握手，兴奋地说：“老刘，还在报馆么？来采访我们啦？好！”

他的嗓音还跟六年前一样，稍微有点沙哑。脸胖了，面色却发黄了。没等我说明来意，就拉着我跟他一道去巡视工地，要给我看看，对我讲讲。

在便桥头上，他领了两件救生衣，给我一件。一面吃力地结着背后的那个扣子，一面笑着说：

“制度！这是制度啊。不穿救生衣，队长也不许上桥。现在不比从前，甚么都得有个制度。”

紧靠着这座便桥，一个巨大的拱形铁桥正在建造。从下面望上去，这座拱桥的工程显得分外雄伟。第一个拱架已经造好，从河南岸起上升成一个半圆，象一条彩虹似的。简直